

《论语》中西英译本对比研究 ——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中心

秦芳芳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中国 厦门 361102)

摘要: 经典的翻译是中国文化向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有效途径之一。其中,《论语》在典籍的对外传播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虽然《论语》的英译历史并不长,但因其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它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迅速而广泛,成为中国经典外传的典型示例。而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还是通过海内外学者对《论语》文本的翻译和阐释。本文对《论语》英译的发展历程做了简要回顾,对英译《论语》的动因做了简单分析,并集中对比19世纪出版的理雅各和辜鸿铭二人的《论语》英译本,从文本意义与风格、对《论语》的误译两方面进行了比较。除了从语言层面对两个版本的英译进行探讨,还深入到《论语》文本的核心观念层次,探讨经典翻译中的文化阐释和传播问题,揭示了造成翻译不准确或误读的深层原因。最后,对今后的《论语》及其他典籍翻译和传播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论语》英译; 文化阐释; 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 H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221-9056(2017)09-1267-09

DOI 编码: 10.14095/j.cnki.oce.2017.09.011

《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作品之一,是中国人的哲学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集中体现,《论语》英译的研究对今后的传统典籍翻译和对外传播具有主要的学术价值。

16世纪末,耶稣会士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带着传播基督教的使命来到中国本土,遭遇了当时作为明王朝正统思想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产生了碰撞。一方面,西方宗教信仰和科学知识的到来给传统的中国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的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也被传教士们翻译出版,在西方推广传播,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为了顺利实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大都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中文,研究中国当时的主流思想,并努力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他们通过书信和著述的方式向西方介绍中国,大批儒家经典被陆续翻译成拉丁语、法语、德语、英语等各种语言在欧洲出版。传教士们选择儒家经典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儒家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统治阶级所秉持的正统意识。传教士们认为,只有了解儒

收稿日期: 2017-02-17

作者简介: 秦芳芳,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Email: 331299386@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世纪稀见英文期刊与汉语域外传播研究”(15BYY0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7-19世纪欧洲汉学视野中的汉语类型特征研究”(13YJAZH021)、厦门大学社科繁荣计划科研启动项目“欧洲的汉语传播与华文跨境教育研究”(HGF04)的阶段性成果,方环海为本文通讯作者。同时,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参考了学界有关论著的论点,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海外华文教育》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中不妥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家思想才有可能获得中国上层社会人士的支持,他们的传教事业才能得以进行,才能真正产生影响;二是他们认为孔子思想与基督教教义具有相通性,与其他学派相比,儒家与基督教更能和谐共处(事实上当时的儒学已经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兼采诸子百家,与孔子初创时已大有不同)。

一、《论语》英译的发展历程

严格意义上说,《论语》英译开始于 17 世纪早期,(最早的《论语》英译本出现在 1691 年,是从拉丁文转译而来的)一直延续至今,且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欧美汉学研究水平的提高,《论语》的复译在数量上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19 世纪,英译《论语》的多为英国来华传教士,在本文所选择研究的译者理雅各之前主要有两人,一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他将《论语》的前十篇翻译出版,译名为“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他完全采用直译的方式,尽可能使译文与原文在词序和句法保持对应,在文本意义的阐释上,他选择完全依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解释。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马士曼没有参考任何的《论语》英译本,其他的文献资料也相当匮乏,再加上受到“礼仪之争”的影响,他本人一生未能进入中国境内,无法与中国学术界沟通交流,该译本的质量也自然得不到保证;二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英华书院院长柯大卫(David Collie, ?-1828),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英译“四书”的人,(马祖毅、任荣珍, 2003: 42)其“四书”译本的英译名为“The Chinese Classic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与马士曼相比,柯大卫有了可以参照的《论语》拉丁文译本和马士曼的英译本,而且他还把“四书”的英译本用作书院里中国学生学习英文的教材,他的译文得以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修改。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经典英译被视为是里程碑式的翻译,这主要是由于他的经典译作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他是目前翻译中国典籍最多的西方汉学家。除了数量上的优势以外,理雅各的译作质量也颇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他的《中国经典》译本每一页按照原文,译文,注释分别排列,其中注释部分占了极大的篇幅。在第一卷正文之前有很长的“导言”,介绍了孔子的生平、儒家思想以及对他儒家学说的总体评价。

辜鸿铭(1857-1928)比理雅各稍晚,是最早将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的中国人,其《论语》英译本在 1898 年出版。在翻译中,辜鸿铭采用归化策略,在注释方面,常用西方历史上的人与物来比喻儒经中的人与物,用基督教和西方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来比拟《论语》中的一些人,译本行文流畅,富有文采。

传教士汉学之后,西方汉学进入专业汉学时期。这一阶段,译介经典影响较大的是英国汉学家翟里斯(Lionel Giles, 1875-1958),他批驳了长期以来西方对儒家思想的错误认知,正文部分别出心裁地将章节按主题进行了分类,打破了原书的布局,使《论语》看起来更有条理,更具系统性。这样的改动反映出了翟氏本人对《论语》的独特解读。林语堂(1895-1976)是继辜鸿铭之后,把《论语》译成英文的又一个中国人,他对《论语》的部分章节进行了英译,并且像翟里斯一样将孔子的言论根据不同主题分成了数篇。到 20 世纪,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的《论语》译本于 1938 年在伦敦出版。目前,该译本已经成为最流行的《论语》译本之一。

亚瑟·韦利之后,随着美国汉学的兴起,美国逐渐成为汉学研究的重镇。这一时期,美国汉学家和华人在《论语》英译中担任了不可替代的角色,《论语》复译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且译本风格也更加多元化,有哲学型翻译(安乐哲、罗思文译本),学术性译本(斯林哲兰德译本),有针对普通读者的大众型翻译(亨顿译本),甚至还有适合青少年读者阅读的插图版译本。这一时期的国外译本最具代表性的是庞德的译本,他的译本主观发挥较多,极具创造性,这与其诗人的身份和相对薄弱的汉学功底有关。安乐哲和罗思文的译本强调中西哲学的差异,美国作家和汉学家亨顿的《论语》

译本面向普通读者,通俗易懂,可读性高。英译《论语》的海外华人代表有刘殿爵、黄治中、李祥甫等。国内从事《论语》翻译工作的有北外的梅毅仁,还有刘重德、罗志野、杨伯峻、王福林等,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不同的历史时期,译者来自不同背景,他们怀抱着不同的翻译目的,使得《论语》翻译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其中,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的过渡时期是学界争论最多的阶段之一,这一时期涉及文化阐释者的身份变更(金学勤,2009)还涉及到译者的国别问题,笔者选择对理雅各和辜鸿铭两位极具代表性的译者及其译作进行探讨。

二、英译《论语》的动因

翻译从来就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在具体的现实环境下,译者从事的翻译活动,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翻译是不同语码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因此必然受到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操控。(徐珺,2014)在翻译交流展开的时候,源语文本的选择,译者的动机和翻译策略,具体的翻译方法,译本的流传和译文读者的选择都受到诸如主流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17世纪以来,西方各国传教士们在客观上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早期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带着传播福音、将儒经“为我所用”的目的翻译儒经。理雅各继承了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们在中国开辟的传教传统,采取了一系列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策略,其中,将儒家经典翻译成西方语言在他们看来是行之有效的传教方法之一。

与耶稣会士不同的是,理雅各将儒家经典翻译成了英文,而不是拉丁文、法文等。理雅各之前,有马士曼和柯大卫翻译过儒家经典,但理雅各认为他们的翻译不成系统且比较粗糙,他历经重重困难将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理雅各自己在解释为什么要把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时说: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伟大的帝国,尤其是为了顺利开展我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并获得永久的成功,这样的学术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将孔子所有的著作翻译并加上注释出版,会为未来的传教士们开展传教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理雅各,1960:1)理雅各抱着这样的目的来解读和阐释《论语》,也直接影响了其对文本意义的考证和最终的选择,以及他对儒家思想体系的整个评价。

辜鸿铭作为第一个把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的中国人,他的翻译动机与作为传教士的理雅各的翻译动机截然相反。辜鸿铭出生于一个华侨家庭,从小就学习英文。后留学英国,师从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卡莱尔。十多年的留学和生活经历,也为其日后英译《论语》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在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辜鸿铭看到西方强大的物质世界背后的道德沦丧。回国后,目睹古老的华夏文明惨遭西方列强凌辱的现实,辜鸿铭的保守主义文化观就此形成,具体以现在他强烈批判西方的物质文化和道德沦丧,而极力宣扬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此外,对欧洲的了解使得辜鸿铭观照中国社会的文化时有了独特的视角,文化的迥异和心理上的落差成为辜氏美化东方的内在动因。他认为,理雅各的《中国经典》未能理解儒经的真谛,其翻译显得行文呆板且错漏百出,没有把中国的文学和哲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辜氏对西方汉学家尤其是理雅各儒经翻译的强烈不满成为他翻译儒经的直接动因。

翻译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交流过程,但它首先是一个语码转换的问题。语言是文本意义和文化信息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最集中的表现方式。译文在何种程度上传达原文意旨、再现原文风格,这与译者使用语言的方式和水平密切相关。文化是不断变更和发展的,语言也一样。译者生活的时代、接受的教育、具备的文学修养,还有意识形态观念、宗教信仰、翻译动机、采用的翻译策略,都与译者的语言紧密相关。从功能主义的“目的论”来看,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目的尤其与译者的翻译

策略和具体方法有着重要的因果联系。就《论语》英译本而言,不同译本如传教士译本和专业汉学家译本,无论在译文的词汇选择和使用上,还是在整体的语言特征上都有差异。这除了与译者本人的学术修养和性情有关之外,更与他们特别的翻译动机和目的相关。

三、文本意义与风格的比较

(一) 文本释义上的差异

理雅各的《论语》译本采用的是典型的学术型翻译(scholarly translation)。如前文所说,理雅各将《论语》放在《中国经典》的第一卷。《中国经典》中注释部分占据了几乎整个正文的三分之一还多,除了对原文文义的注解以外,理氏还对一些关键术语作了解释和评价,并且加入了自己的认识。《论语》20篇,每一篇的篇首都有对该篇要旨的简单概括以及篇名意义的解释;正文的每一句都有注释,按基本结构划分,每章的注释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对该章大意进行极简的概括,全用大写字母书写。之后,解释该章中的文化负载词和疑难的字词,其中还经常出现这些词汇意义与英语中文化词的对比。最后是理雅各对文本内容的评论,或对其他可供参考的解释的介绍。采用如此详尽的注释,将语言高度精炼的《论语》翻译成一部冗长的译作,降低了文本的可读性,再加上理雅各的诸多注释准确性存疑,自然遭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但是客观来说,理氏的译本利大于弊。他的译本内容丰富,详尽的注释为读者提供了大量关于字、词、句、章、篇的信息以及可能的不同解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他继承了中国的经书注疏传统,让读者对儒经注疏这一独具特色的中国学术传统有所认识,也为后来的译者在典籍翻译的方法上提供了借鉴,为中国经典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理雅各的“学术型翻译”与其翻译的动机和目的紧密相关。按照理氏的标准,文本的意义是第一位的。他追求准确传达经文的意思,并尽量保持译文与原文的行文结构一致,因此采用直译的方法,有时甚至是逐字翻译。这种在行文的词序和结构上紧贴原文,追求句式对应的翻译,与理雅各的翻译原则和意向读者有关。他最初翻译儒经就是为了为后来的传教士提供学习中国语言的教材,这种“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方法更能帮助初学者把握《论语》的特点。整体上看,理雅各的努力是成功的,也体现了他高超的翻译技能,然而,这样的翻译方法导致了译文有时用词别扭,结构生硬,句子冗长,文本意义晦涩难懂。

辜鸿铭的《论语》译本跟理雅各的译本形成鲜明对比。与理氏译本相比,辜氏的译本不仅没有《论语》原文,注释也很少。在翻译时,辜鸿铭大多采用目的语读者熟悉的词汇,使用现代英语中地道的句子结构,因此,他的译文流畅易懂,富于文采。在辜鸿铭看来,《论语》不仅是一部哲学和伦理的著作,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他批评理雅各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认为理氏的译文句式冗长,行文僵化,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辜氏在翻译过程中就非常小心避免这些缺陷。他对《论语》中的专有名称和术语的处理别具一格。比如将原文中除颜回和子路以外的孔门弟子的名字都译作“a disciple(一个弟子)”,将当时除鲁国(the native State of Confucius)以外的诸侯国译作“a certain State(某国)”或“a foreign State(外国)”;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中的《诗》译为“The Book of Ballads, Songs and Psalms”,而不是最常用的译法“The Book of Poetry”。但可以想见的是,辜氏选择用英文的固有词汇来翻译儒经中的特有概念,就不免牵强甚至相去甚远。例如,他常常将“礼”译作“art”,通篇都将“君子”译作“a wise man”。从注释上看,如前文提到的,辜鸿铭用西方历史人物与物比喻《论语》中提及的人与物。他常用基督教和西方历史上的人物来比喻《论语》中的一些人。在《为政》篇第十章译文的脚注中,他将颜回比喻成“The St. 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意思是“孔门福音中的圣约翰”,这实际上是将孔子最宠爱的弟子比作耶稣最宠爱的圣徒。将“《诗》三百,一

言以蔽之”中的《诗》译为“The Book of Ballads, Songs and Psalms”,其中“Psalms”是指赞美诗或《旧约》中的诗篇。在整个译本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外,辜氏大量采用西方思想家、作家、诗人的言语为《论语》中的章节加注,并不时对中西文化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比较阐释,辜氏《论语》英译本的副标题就是“一部引用各地和其他西方作家言语作解释的新的特别译本”。在正文中,辜鸿铭善于通过增加适当的字词实现上下文的连贯,把《论语》的对话体语言很好地再现出来,因此他的译文读来生动有趣,地道自然。

(二) 译文风格上的差异

《论语》本身就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作品,全书语言精练但意义丰富,有抒情有说理,运用多种修辞手段,刻画了许多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前文谈到,理雅各的译本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尽量和原文句式保持一致。但是汉语和英语存在巨大差异,要将含蓄简约的古代汉语转换成要求形式完整句意明晰的现代英语,难度可想而知。在词汇选择上,理氏多选用正式用语,书面气息浓厚,且经常显得生涩和不恰当。在汉语句子里出现排比和并列时,常有不必要的重复。有时,为了与原文词序统一,理氏将英文句子的结构做了大幅调整,使得整个句子生硬古怪。这无疑与《论语》原文活泼轻快和高度隐喻的特点分道扬镳。

辜氏强调《论语》本身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他翻译《论语》的直接目的就是纠正理雅各译文存在的问题。他的译文基本能够准确地把握原文的风格和气势,且注重传达原文中对话体的语气,此外还注意增加一些小词来增强对话的生动性。例如:

1.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

理雅各译文: Yen Yuan, in admiration of the Master's doctrines, sighed and said, 'I looked up to them, and they seemed to become more high; I tried to penetrate them, and they seemed to become more firm; I looked at them before me, and suddenly they seemed to be behind.'

辜鸿铭译文: A disciple, the favourite Yen Hui, speaking in admiration of Confucius' teaching, remarked, "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have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两段译文高下立见,理雅各的译本显然刻意追求与原文句子结构的一致,使译文看起来生硬别扭,没有生气;而辜鸿铭的译本则非常巧妙地运用了一个比较级的结构,是英文中地道的表达,且译文中添加的语气词“lo!”起了点睛的作用,将整个对话的场景都活化了。

2.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

理雅各译文: The Master said, "My doctrines make no way. I will get upon a raft, and float about on the sea. He that will accompany me will be Yu, I dare to say." Tsze-lu hearing this was glad, upon which the Master said, "Yu is fonder of daring than I am. He does not exercise his judgment upon matters."

辜鸿铭译文: Confucius on one occasion remarked, "There is no order and justice now in the government in China. I will betake me to a ship and sail over the sea to seek for it in other countries. If I take anybody with me, I will take Yu." referring a disciple.

The disciple referred to, when he heard of what Confucius said, was glad, and offered to go.

"My friend," said Confucius then to him, "You have certainly more courage than I have; only you do not exercise judgment when using it."

在这里,辜鸿铭用了英文作品种最常用的断句方式,在孔子的言语之后,添加了“referring a disciple”在最后的回应前,加了一个“My friend”,其实是对他的学生说话,“My friend”这样显得孔子平易近人,幽默鲜活。相较于理雅各一味的“the master said”,辜氏的译法则灵活得多。

总之,从语言层面来讲,两个译本在领会文义传达和译文风格上存在明显差异。

四、对《论语》的误译对比

《论语》是一部语言高度简练的作品,这一特点也使得它难解,容易造成歧义。语言本身的变迁,具体语境的缺乏,社会背景的变化更为《论语》文本的理解增加了难度。历代注疏家对《论语》的解读就各有不同。中国的学者们对于《论语》尚有解释不清的地方,外国学者在理解上的偏差就更是在所难免。

理雅各对《论语》文本的误读误译主要体现在对个别字句的理解不准确以及对某些章节中的整句所传达的思想和概念理解不当。这主要是因为理氏在从事《论语》的翻译工作时,汉学功底还不够扎实,当时还没有中国学者王韬的细心帮助,何进善、洪仁玕在翻译上给与他的帮助其实甚少,他在很多疑难地方未能准确把握儒经真义,过分拘泥于文本的字面意思和句子形式,又过度依赖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导致了一些地方受到了朱熹误读的影响。举例为证:

3.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篇第十章)

理雅各译文: Confucius said, “The superior man has nine things which are subjects with him of thoughtful consideration. In regard to the use of his eyes, he is anxious to see clearly. In regard to the use of his ears, he is anxious to hear distinctly. In regard to his countenance, he is anxious that it should be benign. In regard to his demeanour, he is anxious that it should be respectful. In regard to his speech, he is anxious that it should be sincere. In regard to his doing of business, he is anxious that it should be reverently careful. In regard to what he doubts about, he is anxious to question others. When he is angry, he thinks of the difficulties. When he sees gain to be got, he thinks of righteousness.”

可以看出,理雅各的遣词用句非常地书面化,句式的重复也是为了与原文保持一致,但他并没有将每个词的意义都阐释明确。比如“忿思难”中的“难”,他译作“difficulties”,并且注释中也未做解释。原句意思是“在愤怒的时候要考虑可能造成的后果”,理氏的翻译让人不知所以。

辜鸿铭的译本在字词理解上的失误不在少数。在特有概念的名称上,辜氏过分追求英文表达的地道,常常用词太过牵强,它对儒家哲学中的特定术语的处理也相当值得商榷。以下举出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

4.子曰“君子不器。”

理雅各译文: The Master said, “The accomplished scholar is not a utensil.”

辜鸿铭译文: Confucius remarked, “A wise man will not make himself into a mere machine fit only to do one kind of work.”(《为政》篇第十二章)

原文意思是君子不会拘泥于教条形式。辜鸿铭的译文回译过来就是“明智的人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可怜的机器,只适合一种工作”。这种译法显然是不合适的,其一,“君子”不是简单的一个“wise man”可以解释的;其二,辜氏只翻译了原文的字面意思,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其深层的含义在译文中难以知晓。理氏在这里将“器”译作“utensil”,但他在注释里做了解释:不同的器具有其特定的用法,“utensil”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

5.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篇第十四章)

辜鸿铭译文: Confucius remarked, “The civilisation of the present Chou dynasty is founded on the civilisation of the two preceding dynasties. How splendidly rich it is in all the art! I prefer the present Chou civilisation.”

此处,周借鉴与夏商两代的是“礼”,将“礼”译作“civilisation”,明显将概念扩大化了,而后面的“art”也很偏颇。笔者认为,理雅各将其译作“regulation”似乎更为恰当。

五、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和文化阐释

《论语》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哲学典籍,直到今天仍是中国人重要的精神源泉。单从语言层面对其英译进行探讨是不完整的。作为《论语》的译者,无法回避地要对原文本所体现的哲学内涵和核心价值作出解释,而这两者主要是通过核心概念得以体现的。《论语》涉及的核心概念有数十个,最重要的便是“仁”。此外还有“礼”“义”“德”“君子”等等。这里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概念“仁”和“君子”,分别探讨理、辜二人的翻译。

(一) “仁”的翻译与理解

“仁”是在《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概念,一共出现了109次。西方译者认为,“仁”在英语里没有一个统一的对应词,翻译时要放在具体的语境当中,根据上下文做出不同的解释。狭义的“仁”与“智”“礼”“勇”一样是指一种具体的德行,但是在《论语》的绝大部分地方,“仁”是用来指完美的德行,这种广义层面上,它涵盖了“智”“孝”“忠”“礼”等多重内容。

两位译者第一次遭遇“仁”是在《学而》篇的第二章,举例说明如下:

6.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篇第二章)

理雅各译文: The superior man bends his attention to what is radical. That being established, all practical courses naturally grow up.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submission! —are they not the root of all benevolent actions?

辜鸿铭译文: A wise man devotes his attention to what is essential in the foundation of life, when the foundation is laid, wisdom will come. Now, to be a good son and a good citizen—do not these form the foundation of a moral life.

在这里,理雅各援引了朱熹的注解“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the principle of love, the virtue of the heart),将“仁”译作“benevolent”,并且解释道“benevolence”与“仁”的意思相近,但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译名。“benevolence”意为“仁慈,善举”,强调的是利他。“仁”本义专治君王或统治者对下属和臣民的仁慈之心。根据原文文意,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治国的根本。理氏在此处将“仁”做此翻译是很恰当的。辜鸿铭则将“仁”翻译为“moral”,即“道德”。这体现了他对道德的强调,但无形中扩大了“仁”在这里的涵义。

7.子曰:“巧言令色,鲜仁矣。”(《学而》篇第三章)

理雅各译文: The master said, “Fine words and an insinuating appearance are seldom associated with true virtue.”

辜鸿铭译文: Confucius remarked, “With plausible speech and fine manners will seldom be found moral character.”

理氏在此处将“仁”译作“true virtue”,说明理雅各明白“仁”有着不同的意义,在此处做了区分。实际上,在以后的译文中,理雅各用的最多的译名就是“virtue”,“virtue”基本意思是“崇高的德行”,但在《论语》中还有一个“德”字。显然“仁”与“德”是不同层面的概念,“仁”的涵义要比“德”广泛的多。在《述而》篇中,“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为“上天把德赋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在此处认为自己是德之人,但他从未以“仁”来赞许自己。笔者认为,“virtue”用来翻译“德”这个概念更为合适,但辜鸿铭同第一次一样,将“仁”翻译为“moral”,且在以后出现“仁”的场合中基本都将

其译作了“moral”不是辜氏不明白文中“仁”的涵义各有不同,而是刻意追求译名的统一,为了使西方的读者阅读方便,也让他们对专有的核心概念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 “君子”的翻译与理解

“君子”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仅次于“仁”(108次)。君子在孔子的时代,更多地指称有仁德的、高尚的人。“君子”的英译非常多。理雅各在《学而》篇第一章的注释中解释道,“君子”的本意为“a princely man”,对应的与它意义相反的词是“小人”,“a small man, mean man”,但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对其进行恰当的翻译。例如他在第一章“不亦君子乎”中将“君子”译作“a man of complete virtue”,而在接下来的第二章中将“君子”译成了“the superior man”。在第二章的注释中,理雅各也就此做了解释,他认为此处的“君子”没有前一章的意义强烈(has a less intense signification here than in the last chapter),所以译成了“the superior man”(理雅各,1960:139)。

如我们上文讨论“仁”时所举出的例子,理雅各在大部分时候将“君子”译作“the superior man”,在他看来,“君子”就是尚德之人(理雅各,1960:157),比普通人要高贵,因此,“the superior man”是最好的表达,但理雅各也根据上下文在不同的场合对“君子”做出不同的翻译。比如,在《泰伯》篇第二章“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中,他将“君子”译作“those who are in high stations”,并在注释中解释道这里的“君子”同之前的用法不同,更多地强调地位而不是道德(理雅各,1960:208)。辜鸿铭则如我们上文看到的,他基本上是将“君子”翻译成“wise man”,统一的译名方便了读者,但事实上这无疑简化甚至扭曲了“君子”一词的文化内涵。因为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道德品行的角度来看,“wise man”都没能传达出“君子”的涵义。

在对核心概念词的误读的背后,有其深层的原因。在理氏看来,孔子思想学说远远逊色于基督教的教义。于是,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将基督教的神学观念投射到了儒家思想里面,在译文的导言和注释中甚至将孔子和基督进行比较,或者对《论语》中近似基督教义之处巧做他解,以得出基督胜于孔子的结论,而辜鸿铭在保守主义文化观的指引下,批驳了基督教传教士和汉学家对孔子教义的曲解,用地道的英语表达儒家思想也成为他翻译《论语》的指导原则。辜氏曾在他的译本序言中说过,“我们在翻译中尽可能让孔子及其弟子的交流显得地道流利,就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所要表达中国圣贤们所表达的思想时应当采用的语言一样”,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思想的误读。

六、结 语

综上所述,理雅各的译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为后来的《论语》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同时也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国文化的敲门砖。他的译本不仅如实传达原文本的意义,详尽的注释也把经典注疏的传统带到了西方汉学的视野里。另外,他的译文体例也具有开创性意义,影响了后来学者们的诸多译本。辜鸿铭翻译论语的直接原因就是他对理译本的诸多不满,他纠正了理译本中的不少误译处,也使得后来的译者受益颇多。在孔子形象的构建上,理雅各的译本给人留下的孔子是守旧循礼的道德家形象,辜鸿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认识,在他的笔下,孔子幽默风趣,是个鲜活生动的形象。辜氏的译本文采斐然,可读性强,在西方世界产生不小的影响。

经典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但经典从来不是静止的,对于经典的翻译也会一直进行下去,对于翻译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还是要看到,经典(包括《论语》)的翻译者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无一不是将其自身传统的特定视域同经典传统的流动视域相结合,以实现自我的价值诉求。(王琰,2012)这给我们的启发是,在进行经典的翻译和传播活动的时候,要尽可能利用多方面的有利因素,弘扬中国传统经典中所涵括的优秀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 邓联健《委曲求传: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史 1807-1850》,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 段怀清《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3 期。
- 辜鸿铭《西播<论语>回译: 辜鸿铭英译<论语>详释》,王京涛译注,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3 年。
- 韩 星、韩秋宇《儒家“君子”概念英译浅析——以理雅各、韦利英译“论语”为例》,《外语学刊》2016 年第 1 期。
- 胡适主编《文化怪杰辜鸿铭》,长沙: 岳麓书社,1988 年。
- 金学勤《<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 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 理雅各、马清河译《汉学家理雅各传》,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年。
- 王 琰《汉语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上海: 上海外国语出版社 2012 年。
- 徐 珺《汉文化经典外译: 理论与实践》,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岳 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 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年。
- Arthur Wale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1-2, Shanghai: Hua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nglishment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Respectively Written by James Legge and Ku Hung-Ming

QIN Fangfang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102 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c transl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lthough the histor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not long, it spread quickly and widely in the English world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main way of transmission is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has a simple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on to English translate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n compare the meaning of text, styl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mistranslation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from Legge and Ku Hung-ming). In addition to study the two versions from the language, also deep into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o discuss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during the classical translation. Then reveals the deep cause of the inaccurate translation and misreading. Finally,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other classic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Confucius Analect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contrastive study